



##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从歧途到正途：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价值何在？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8-29

[作者] 刘俐俐

[单位]

[摘要] 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已经是个老话题，但回应是当下性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摆脱简单地对后殖民理论表示赞成或反对、而超越于后殖民理论本身，努力摆脱误读走向正读的阶段。我们已经认识到，对任何西方的文学理论，都应考察它的产生基础和背景，考察它横移到中国本土后在哪些方面可以经过选择性及创造性的吸收，融汇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之中，哪些方面是无法融合的。

[关键词] 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中国文学批评

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已经是个老话题，但回应是当下性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摆脱简单地对后殖民理论表示赞成或反对、而超越于后殖民理论本身，努力摆脱误读走向正读的阶段。我们已经认识到，对任何西方的文学理论，都应考察它的产生基础和背景，考察它横移到中国本土后在哪些方面可以经过选择性及创造性的吸收，融汇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之中，哪些方面是无法融合的。一、选择及创造性地运用是必须的。后殖民理论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话语理论等后现代主义为基础的，为的是解构西方霸权的文本系统，反思和批判殖民历史结束以后文化殖民的延续等。它的产生无疑是根植在西方对东方和印第安人的殖民历史事实之上的。这与中国历史背景有所不同。中国在事实上从来没有过纯粹意义的殖民地历史，从十九世纪乃至更早开始，中国人就曾经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向西方求新法。正如鲁迅所描绘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因此，运用后殖民理论所考察我们的文学，就面临着和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因为简单地将后殖民理论横移过来，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的错误理解和判断。比如有的学者说：“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见《文化新殖民的一文》，载《读书》1996年2期）必须选择的第二个理由是，事实上，对后殖民理论的误读已经存在。徐贲的专著《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和赵稀方的论文《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及其他一些学者都曾经描述过误读的情形及原因。他们主要批评张颐武所谓的第三世界批评，认为：“在中国的后殖民批评中，后殖民理论是作为一种消解西方现代性话语、建立中国的‘民族性’的工具而出现的。”而这样的理解运用后殖民理论，正与萨义德所持的对民族主义批评态度相反。而徐贲则更尖锐地指出，民族的本土的批评姿态，是知识分子为自己增势、借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语境中与西方相比的弱势而求得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表现。其中蕴涵的对于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被误读的更深层的文化和知识分子根性的批评也是显而易见的。二、选择什么？选择是对选择对象的认识过程，选择包含有识别、确认、判断的意义在里面。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中，应该选择后殖民理论的精髓和思想方法，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从西方横移到中国。笔者以为，后殖民理论如下精髓和思路值得融入中国的文学批评。第一，对抗性思想。对于批评，萨义德说：“如果我用一个词永远同批评联系在一起（不是用作修饰语，而是用作对批评的强调），那么这个词就是‘对抗’。”对萨义德来说，对抗首先意味着道义的反抗。他说：“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是为改善人的生活的。批评的本质就是反抗各种形式的暴政、统治和滥用权力。”（转引自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第164-165页）我以为，后殖民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性与这样自觉的对抗意识是分不开的，对抗首先是一种精神。对抗的对象是很宽泛的，不仅限于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和东方主义，而是对着一切不人道的、不符合人性的非进步的思想、作为等，对东方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只是这样对抗精神的一种表现而已。如果这样理解和吸收，就会开拓出批评广阔的空间：一切有碍进步、不人道的、不民主的、压抑民族精神的都可列在对抗的范围内。张颐武等的第三世界批评是将批评的矛头对外的，对着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批评某些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他者”，而宽泛地理解“对抗性”之后，批评的可适用性增强了。对抗性潜在的意义是批判性、边缘意识和反思性。对抗是向着某种居于强势地位的思想、力量和行为的，对抗的主体往往居于边缘地位，这使得对抗的主体有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中国古人就有“文章憎命达”的思想，文学总是与失意者、与边缘感受在一起，边缘是文学激情诞生的所在。运用对抗性意识，发现边缘感受和边缘的文学现象，正是运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神来之笔。比如，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沉默现象、与全国性文学存在的选材、艺术追求和风格的距离等，都可纳入批评。

对抗性思想其实也可解释成是各种文学思想中都有的，不过是用其他的语词表述而已，那么，后殖民理论的对抗性思想独特的价值何在？这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独特性是否可在下面的更具体的思路中体现出来？第二，空间意识。后殖民理论包含对殖民地历史的反思，时间上的回溯依赖空间的反思，这样的理论提炼出东方的"被看"和西方文化霸权对东方的"看"的思考范畴。"看"与"被看"都有主体，也都有自觉与不自觉的问题。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已经意识到"事实的存在远没有在诗学意义上被赋予的空间重要，空间通过诗学的过程获得了情感甚至理智。萨义德引述了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的观点证实自己的看法，而且列举了文学经典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女祭司》，说明空间总是审视者"看"的空间，有意识的占有才有"看"的自如，"看"赋予了空间以题材的意义，给出了形象的可能性。这样认识就摆脱了仅仅可以表达前殖民地或被殖民的东方被西方文化所"看"的具体所指，而具有了可普遍地运用的审美视角和方法。自觉地从这样的思路进行文学批评的文字还少见，自觉地先行者是姚新勇的研究张承志的论文《呈现、批判与重建--"后殖民主义"时代中的张承志》（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1期）他指出张承志80年代初是从汉文化中心地带为观察点，把另外的边疆土地当作待征服的异域，在艺术表现上就是征服/异域的阶段；从1984年开始，他的立足点移到了少数民族的土地上，他则作为真正的儿子、歌手、民族历史的叙述者来看少数民族，看汉族的，这是呈现/家园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战斗/墓地的阶段，这时他走向了一个对汉族文化中心兼及西方外来文化的双向疏离之途。正如姚新勇所概括的："当他终于攀上了人生世界的第四个极致、沉醉于哲合忍耶教的洁美时，当他给中国终于奉献出了《心灵史》时，他就完成了一次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回归。"这是他立足在哲合忍耶的战斗墓地，向西方文化也向汉族文化的空间审视的时期。他以此尖锐地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将儒学作为对抗西方文化挑战的旗帜是忽视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异质成分，并试图为主流文化--汉文化--的强健注入少数民族文化的血液。而这样的见识是源于姚新勇空间转换思维方式的，他的论文标示出了后殖民理论中的空间意识的价值。第三，可用于文艺学研究的方法。在萨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获得在作家、作品研究中的新的眼光和维度，比如关于创造主体。萨义德在反思性研究东方学时发现，西方作家身不由己地被笼罩在西方文化和东方学的视野中，他们的想象也因此被纳入一个框架，这样，东方学的传统、文化和规范就遏制了作家的原创性。这给予我们从大的文化背景思考作家的主体世界与文化的关系，尤其思考其消极的作用。萨义德还发现，叙述因为必得面对动态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的改变，而东方学家从本质上是将东方凝固化的，所以，他们都回避纵向的叙述，其中的一些东方学作家就宁愿采用百科全书或字典编撰这种横截面式的想象视野，这正是抑制作家创造性的表现。这就将对作家的研究过度到文本乃至文化样式的研究了。对于东方人自己创造的文本，在东方学家看来，东方无力表述自己，只能由西方人表述他们，萨义德总结出，东方学家于是对东方人的原创性的作品进行"片段化"，而且有被重新印行、解释、评注而产生的片段之片段，"文选"不仅替代了和补充了东方，而且遮蔽了东方，于是给予我们的文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分析文选意识和文选行为，意识到文选化中总有"在场和缺席"，文选化中原创者是"缺席的他者"，这将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路和方法。对东方学的研究，萨义德还发现了当文学被一种文化覆盖了之后，出现了意象的互通和隐喻的漫游的现象，仅用互文指涉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事实是，文本一旦形成互相指涉，也就标示着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成了操纵者。这样的特定文学研究方法，具有普适性，是可被我们所用的，而且，其中渗透了米歇尔-福柯和路易-阿尔都塞所谓文本实践与权力关系的思想，也有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比如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因素，之所以指出这点，是为了说明，接受后殖民理论有价值的方法论，其背后的理论基础与我们目前的理论视野是相通的。中国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的接受，正在从误读走向选择、创造性的接受，这是我们可以和西方对话的保证。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mailto:leisun@firstlight.cn)

